

November 2017

A Study of Franco Moretti's "Materialism of Form"

Chunrong Qi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Qian, Chunrong. 2017. "A Study of Franco Moretti's "Materialism of For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6): pp.204-21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6/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莫莱蒂“形式的唯物主义”探析

钱春蓉

摘要: 弗兰克·莫莱蒂直接受到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追求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他使用计量方法是最具体的体现。当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莫莱蒂的整个思维的主要语境。虽然接受了卢卡奇的命题“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但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莫莱蒂对该命题的思考体现出三个特色:第一,形式不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存在,或者是为了理论的需要性存在,他将其落实为文体理论和文体实践与样式;第二,对形式的认知不是采用形而上学的演绎方式和经验论的归纳模式,而是直面文体形式的数量态、时间态、历史态和地理空间态;第三,他对文体形态的剖析使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应该说,其马克思主义立场就体现在不断地使用和贴近文体的物态或者物质性。这就是他的“形式的唯物主义”这个总命题所涵盖的方面和指向的内容。

关键词: 莫莱蒂; 形式; 唯物主义; 计量

作者简介: 钱春蓉,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通信地址:成都市长江路三段17号四川现代艺术学校,邮政编码:610225,电子邮箱:81626763@163.com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4AZD040]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tudy of Franco Moretti's "Materialism of Form"

Abstract: Directly influenced by Galvano Della Volpe's Positivist Marxism, Franco Moretti pursues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literary research. The most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s his use of metering method. Of course, Althusser's Structuralist Marxism is the main context for Moretti's entire thought. Though he accepts Lukacs's proposition that "forms are the true social factor in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unique features in his thinking about the proposi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Marxists. Firstly, forms are not conceptual or abstract, nor do they exist for the need of theories. Rather, forms are a part of stylistic theories, stylistic practices and styles. Secondly, forms are not recognized by means of metaphysical deduction or empirical conclusion, but directly involving the state of number, time, history and geographical space. Thirdly, he analyzes stylistic features with a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Moretti has constantly used and been close to physical state or materiality of stylistic features, which reflects his Marxist standpoint. Such is the content covered by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of his "Materialism of forms".

Keywords: Franco Moretti; forms, Materialism; Metering

Author: Qian Chunrong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interest in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aesthetics. Address: Sichuan Modern Art School, No. 17, 3rd Part of Changjiang Road,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610225. Email: 81626763@163.com This paper is fund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of China (14AZD040).

意大利学者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因为使用计量方法进行文学研究而蜚声西方学

界,被誉为“上世纪末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也是对文学批评进行革命并让小说家以不同的方式思

考小说的生产与接受的主要力量之一”(Evenson 149-53)。

笔者认为,莫莱蒂理论的主要特色不在于对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发表直接意见,而是像卢卡奇一样,直面欧美文学研究的共同问题,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广泛吸收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文学史研究、文体研究的一些专门性问题,在当代世界文学理论领域展示了用马克思主义文论解决当代文学问题的实力,扩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然而,莫莱蒂思想的心理理论,也是最能体现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命题——“形式的唯物主义”,至今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莫莱蒂的“形式的唯物主义”概念进行诠释和评价,并由此探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的意义。

—

“形式的唯物主义”一词最早见于莫莱蒂《论文学的演变》一文。此文的起点是对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辨析。莫莱蒂认为,拉马克主义将物种的变异视为“定向的”“直接的”,而且人是进化的顶点。这是一元进化论,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在生物学领域的体现。如果将其运用到文学领域会造成诸多曲解。达尔文主义则主张物种变异是“非定向的”“随机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接受自然环境的选择。这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若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于文学史研究就会形成“形式的唯物主义”的新的视野(262-63)。他说:“在这种文学史中,形式相互争斗,由其语境选择,并像自然物种一样发展和消失[……]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前景,文学批评抛弃其当下形而上的虚妄,转向某种形式的唯物主义”(马尔赫恩 130)。这样,文学史在两个环节中演化,“在第一个环节,机遇来临时,创生了文学的修辞性变异;社会需求则掌控着第二个环节,文学的修辞性变异接受历史的选择”(“On Literary Evolution” 262-63)。这就是说,在文学史的演进中,各种文体形式争奇斗妍,文学形式的修辞性变异最终必须接受文学语境无情的自然选择,其优劣在于是否适应文学语境的需要。这不仅是对文学史演化路径的描述,更意味着文学研究必须“抛弃其

当下形而上的虚妄”,进行一种整体文学思想的转型。可以说,这个转型是在阿尔都塞重建唯物主义的思想引导下进行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精神性存在,受经济条件这个物质基础的制约,但阿尔都塞却说:“意识形态具有某种物质的存在。”当然,这个“物质(质料)是在多种意义上而言的,确切地说,它存在于不同的形态当中,而所有这些形态归根到底都源于‘物理学上的’物质”(356-57)。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往往着重从思辨理性角度剖析意识形态层面的精神意识活动,批判理论“‘批判’的传统召唤的是黑格尔的哲学遗产——‘辩证法’多于‘唯物主义’”(马尔赫恩 11)。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特性及其在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文学再生产过程中物质性根源具有突显功能等论述,成为 1968 年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源。莫莱蒂的“形式的唯物主义”观念以阿尔都塞式的唯物主义观念对文学形式研究进行了出色探索。

“形式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含义在于既要重视对文学形式的研究,同时又要坚守唯物主义。这一方面来自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所受到的德拉-沃尔佩的直接影响。德拉-沃尔佩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于他在美学上针对克罗齐唯心主义的直觉说,坚持美学的唯物主义。莫莱蒂继承了沃尔佩的美学唯物主义原则,特别是在文学研究中恪守科学精神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莫莱蒂在 20 世纪后期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做出了自己的创新性选择。西方文学研究源远流长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西方学界自 20 世纪以来在面对文学形式与内容关系时存在着形式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对立,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偏向于社会学立场而直接否定形式主义。但莫莱蒂认为 20 世纪的形式主义文论自有其独到之处,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半壁江山,但必须消解形式主义者与社会学家的对立,抓住文学形式问题进行唯物主义的研究。在 1994 年出版的《现代史诗》里,莫莱蒂说:“一半的形式主义者处理‘如何’;一半的社会学家处理‘为何’。我们赞同形式主义者还是社会学家?是的,如果社会学家接受文学的社会因

素在于它的形式,并且文学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如果形式主义者接受文学随着更大的社会变化而变化——它总是‘紧随’。不论如何,这不意味着重复(‘反映’)已经存在的世界,恰好相反,它解决了由历史造成的问题”(6)。这里提到的形式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分立或脱节,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过程中的难题。马尔赫恩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20)。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处理了文学“为何”的问题,但是一般不太可能在文学“为何”中直接寻找出有关文学的美学形式,即文学“如何”的现成答案。莫莱蒂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不能仅仅重复内容决定形式的套路,必须从社会学立场研究形式问题,在此同时又必须从美学立场研究文学的社会存在和功能等问题,在阿尔都塞式的唯物主义指导下辩证地整合社会学立场与形式美学立场。这种双向视野和双向整合的思路是莫莱蒂“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足点。在2005年出版的《图表、地图、树形: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中,莫莱蒂写道:“如果非要让我给这些尝试指定一个公分母,我可能愿意选择唯物主义的形式概念。它是对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命题的回应吗?既是又不是。是,乃因为那个批判季节的伟大思想——形式是文学最深刻的社会要素,即形式就是力量——对我而言依然有效。不是,则因为我不再相信,单一的阐释框架能解释文学生产的诸多方面和它们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92)。卢卡奇在《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年)中说:“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转引自伊格尔顿24)。1911年的青年卢卡奇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在辩证理性上所揭示的文学形式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关联,却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解决而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卢卡奇命题的缺陷是仅仅思辨地认识到文学形式的社会性,却缺乏实证的唯物主义根基,莫莱蒂要完成的工作是对文学形式这一社会历史状况和社会存在关系的象征作为一

个具有物质性实在基础的对象展开深入分析,把“形式的唯物主义”落实到对文学整体关系的深刻剖析上。他将文学形式落实为文学活动中实体化的文体,社会物质性一端则是社会存在的时间中或者历史中的地理空间。两种实体性因素的存在与交汇构成文学研究的“形式的唯物主义”的两端。

二

在莫莱蒂看来,对文学进行唯物主义研究应当而且可以从形式入手,但是,在思辨理论中,“形式”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与“内容”共同构成一对辩证范畴。这样的“形式”缺乏物质性。雷蒙德·威廉斯说,文化唯物主义是“把精神与物质同时作为一种生产过程的特殊实践的文化理论”(243)。莫莱蒂的“形式的唯物主义”不是一句空洞口号,它不仅必须抓住文学存在的具有物质性的形式一端,而且要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物质性进行提炼,找到一个最具物质性而又与文学生产与再生产实践的物质性紧密结合的实体性因素,才能实现对文学形式本身的唯物主义把握。莫莱蒂在形式的诸多层次中找到文体(Genre)^①这个文学的美学形式要素。这是因为莫莱蒂要使用计量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从文学作品出版物的数量统计入手,在文学书籍出版的数量的波浪形图示中找到在文学史的时间性循环里存在的“历史流动中的暂时结构”,而文体则在不同时间段都是这种“暂时结构”的形态学体现(“Graphs”14)。文体最好地表现了文学的物质性、实体性。一个作家可以说自己是写诗的,写小说的,但不会说是写文学的。文学书籍也是以诗歌、小说或剧本的文体形式承载。各类文体中还有更为细致的分类,比如侦探推理小说与科幻小说在文体上仍然有差别,特别是在图书市场的营销中占据市场大量份额的时间段,各类文体在历史和地理空间上的分布都有所不同。所以,只有抓住文体,才能把“形式的唯物主义”文学思想在文学史研究中落实下去。文体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一种具体化、直观性实体方式。莫莱蒂在《灵魂与哈比——论文学史学的目标和方法》一文中,倡导把文体作为核心要素和支点建构出新形态的文学史。把文体作为文学的核心要素和支点是其“形式的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抓住文体而不是文本作

为文学形式存在的核心要素是其“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大特色。20世纪西方文论流行的文本分析论是阅读理论,文本分析所进行的主要是文本符号在读者阅读接受中的意义产生与呈现过程等,依然在精神意识活动中进行意义解读的思辨论述。而莫莱蒂认为,文体是比文本更为实在、更具物质性的文学存在,把文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物质性的唯物主义立足点。此外,在研究对象上,文本概念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引入文体概念就把研究对象锁定在具有美学形式属性的文学领域。这是“形式的唯物主义”始终关注文体,以文体为研究对象核心的具体举措。

把文体作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和主要研究对象是莫莱蒂把文学形式物质化、实体化的一个逻辑起点。而“形式的唯物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对象的物质化层面,必须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体存在寻求一个社会历史物质性基础的分析点。他在着力探索文学文体形式与其存在的具体地理空间位置的历史关系时直言拥护布罗代尔的“时间性的空间理论”。莫莱蒂说:“费尔南·布罗代尔为经济史预先提出的‘时间性的空间理论’也许对于文学史同样必要,同样前程远大:我们应该把文学的时代划分不仅看做空间里的形象,而且看做时间中的片断。一种包含诸多象征性形式的地理:这难道不是很有刺激性的前景吗?”(马尔赫恩 127)。

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历史构成的“这个表述把任何社会结构都说成是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地基(基础),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是一个隐喻,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空间的隐喻,一个地形学的隐喻”(327-28)。应该说,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方法在理论层次的构架上与马克思的思想有一致之处。阿尔都塞论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历史构成的唯物主义思想时提到了地形学的隐喻这样的理解,不知对莫莱蒂接受布罗代尔的“时间中的地理空间”的史学思想是否有所启发,而实际的情况是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明显具有唯物主义特色,他的多重历史分层而又交互影响的思路是当代学术研究的总体性原则的重要方法。而且布罗代尔的地理学知识和方法实际上纳入了莫莱蒂的

文学研究之中,是他的“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因素之重要一环。

莫莱蒂的文学史研究在审视文体变异时始终没有脱离“时间中地理空间”的唯物主义基础。他坚信,“形式的唯物主义”的文学分析不能完全疏离人们生存的具有时间性的地理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是地理大发现,适应资本对外扩张需要,多年来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势态等活动的集合,实际上就是在特定时间段用地理空间的改变形成新的社会存在的典型事例。而莫莱蒂着眼于研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同一个欧洲,为何以及如何区分出不同的文体形式存在的不同的地理空间,就把“时间中的地理空间”这一现代历史学理论的社会关系论与美学形式主义结合起来了。时间性的地理空间的文体演变是莫莱蒂“形式的唯物主义”文学思想一直关注的文学的社会存在的具体化的核心问题。

文学形式不是文学单纯的躯壳,而是文学文体物种的具体化,文学形式之间的争斗,不是形式决定语境,而是形式依存于语境,形式斗争的结果一般由社会化的语境来选择。这里就把文学的形式和所依存的语境提升为研究文学存在的两个可以分析的根本要素。形式是可感知的实体,语境也有其物质性存在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文学形式所依托的实际的社会历史。可以说,莫莱蒂从自己得心应手的研究中找到了时间性的地理空间这一社会历史的物质性依托。在文学中,文体种类繁多,不断更替,在实体性文体的演变过程中呈现了物质性的文学史。另一方面,他通过文体演变的定量分析,寻绎到文体变化的时间性的空间因素。这样,形式所依托的语境就物质化为文体盛衰的时间性地理空间。

应该说,《图表、地图、树形:文学史的抽象模型》是莫莱蒂的“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论的一次概括、总结和集中展演。图表、地图、树形三者是三个层次的文学史问题的符号性表征。图表来自于计量历史学,地图取自空间地理学,而树形则来源于生物进化论,这三个学科的理论资源直接成为莫莱蒂“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论的阐释工具。

三

莫莱蒂非常认同年鉴学派开创的计量史学并

将之用于文学研究。在计量文体学、主体数据库和书籍统计学等方式中,莫莱蒂选择从书籍统计学(书籍史)入手制定图表,以研究某一时期在某一个国家(即“时间中的地理空间”)小说(叙述)市场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莫莱蒂对小说文体的关注包含了其数量态、时间态和空间态。而正是通过对小说进行计量和绘图,使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体文学史景观。

莫莱蒂使用计量方法进行小说文体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7年出版的《欧洲小说地图集:1800—1900》一书。莫莱蒂不止在书中绘制了近百张地图,如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司各特的苏格兰低地以及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非洲的殖民小说、俄国的观念小说等地图,而且还大量绘制了小说在欧洲的传播和欧洲国家内部输入外国小说和小说输出欧洲的图表。例如1750—1800年的法国小说地理环境、英国流通图书馆经典的出现情况、英国流通图书馆外国小说出现情况、1750—1850年英国文学中外国小说的比例、法国和英国文学中外国小说的比例、1750—1770年英国小说的出版地等,这些图表主要是以柱状图表来呈现的,当然也包括点状图,尤其是在地图上绘制点状图。这些数据都源自莫莱蒂自己的抽样调查。借此,莫莱蒂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小说在文体上没有根本不同,然而,两个国家却在不同地理空间上展开了小说文体的竞争。这造就了英国和法国不同的小说世界。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直存在着欧洲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上,也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上。那么,哪个国家的小说在欧洲乃至更大的世界空间拥有霸权地位?莫莱蒂指出,在东欧和南欧,英国小说的数量远远低于法国小说;而在新教统治的北欧,两个对手差不多持平。从具体的小说类型来看,则是另一番图像,即法国的小说文体占有相当明显的优越。例如,单以乡村小说为例,法国乔治·桑的乡村小说比他的英国同行成功得多;而在世纪的转折期这个时间点上,每个国家又都大批地翻译了法国的感伤小说,相反,它们的英国同行则局促于北欧的狭小地理空间。那么,法国小说能在特定“时间中的空间”里取得霸权地位的原因何在?莫莱蒂的解释是,此乃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胜利在文化领域的延续。具体而言,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英国自身的原因。它陶醉于日不落帝国的美梦,其不断增加的岛国特性产生反弹,致使它失去了与大陆鉴赏品味的对接。第二,法语自身的优势。事实上,法语曾是有教养的欧洲人争相标榜的语言。这就不难理解法国小说为何能借之旅行得很快、很远,能比它的对手早一步抢占图书市场先机。第三,这种不对称是由两种文化传统的主要形态的差异所造成的。可是,在这场激烈斗争的文体形式斗争中,法国并非总是完全处于上风。也就是说,它的霸权地位是不牢固的。最终,把欧洲的各个时间点归总,它又不得不与英国平分秋色,共同享有欧洲小说的中心这样一种尊荣。

如果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小说的地理形态非常特别:它屏蔽了所有外来因素可能对欧洲带来的影响,以此来增强甚至确定那个叫做“欧洲性”的标识。这样一定好么?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欧洲小说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和纯正性。通过文化输出,扩展了自己的地盘。但它却以逐步牺牲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形式创造性和文学发展的自律性为代价,因为在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是中心,其他的处于半边缘或边缘状态。

在2005年的《图表、地图、树形》一书中,莫莱蒂的计量方式更体现出博采众长的合作色彩,他更多地吸纳了其他学者提供的数据。比如,他根据McBurney、Beasley、Raven、Peter Garside等和Andrew Blockd的数据统计图绘制出1710—1850年英国小说年度出版曲线图,研究这140年间英国小说年度出版数量或多或少的社会原因。经过对图表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他认为,根据计量统计,在这140年中,英国小说出版的数量清楚地呈现出1710—1770年、1770—1820年和1820—1850年三个不同阶段。图表显示小说出版数量的增加:在第一个阶段,是“小说成为生活必需品之时”,第二个阶段是“把小说对过往生活的描绘作为现实生活体验的变化”,第三个阶段是“图书市场利益的扩张”(9)。

另一方面,从欧洲小说持续时间的柱状图来看,在1740年到1900年这160年时间里,英国出现过44种小说文体(19)。它们分别为:菜园派小说、新女性小说、帝国哥特小说、自然主义小说、颓废小说、托儿所故事、地域小说、伦敦派小说、乌托邦小说、侵略文学、帝国传奇、校园故事、儿童历险、幻想小说、奇情小说、乡土小说、家庭小

说、宗教小说、教育小说、结果与分析小说、神秘小说、宪章派小说、体育小说、工业小说、转变小说、纽盖特监狱小说、航海故事、军事小说、银叉小说、混杂故事、历史小说、福音小说、村庄故事、民族故事、反雅各宾小说、哥特小说、雅各宾小说、漫游小说、间谍小说、感伤小说、书信体小说、东方故事、流浪汉小说、求爱小说。如此庞大而又丰富的小说家族并非和平共存的,而是不断在争夺文体空间的霸权。从寿命来讲,持续大约 23 年到 35 年的文体占了三分之二。其中,以求爱小说的寿命最长:80 年。只持续了 9—12 年不等的小说也存在,如福音小说、宗教小说、新女性小说、雅各宾小说、反雅各宾小说等。那么,英国是不是个例呢?莫莱蒂惊讶地发现,在 17 世纪到 19 世纪的法国,其大部分叙事类文体的寿命也是 30 年左右。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呢?或者说,为什么有些文体如此短命呢?

从小说文体更迭、变化的波浪式图示来看,一些文体衰竭,一些文体接替霸权地位,其中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读者的改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趣味,如果一个国家(特定地理空间)的文学作品在 25—30 年间(较长时间段)都维持着一种固化的文体系统,原来的读者会逐渐消失(20—21)。这些结论当然不是数量统计直接得出的,而是必须通过地理学的地图和生物进化论的树形等其他模式对图表数据的分析而得出。但是,数量统计是书籍经过出版而存在的物质性客观依据,不可按照主观意图而随意更改数据的图表因此成为“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底层的物质性基础。

四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式就是西方思想史、艺术史无法逃避的一个观念。在 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以及当今的符号学都十分看重形式问题。而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最大的影响在于其跨学科性的研究模式。按照马尔赫恩的说法,莫莱蒂是在这样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马尔赫恩 124)。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符号学)的主要模型是以语言形式为基础的,而莫莱蒂的跨学科性是以文体形式为基础。对莫莱蒂而言,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而文本是小于文体的封闭单位。但是

比较起来,莫莱蒂更追求文体形式的客观性维度,即前文所述的文体的数量态、时间态、历史态和空间态,尤其是时间中的地理空间。文体的这几种形态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见、可察的存在,不需要经过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就能得到。从广义的形式主义范围来看,莫莱蒂的理论带有新批评所向往的客观性,但是却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开创了形式主义研究的新型路径。因此,笔者认为,同样作为形式探究,莫莱蒂恰恰弥补了结构主义之最大不足:抛弃了历史和把结构看成是静态、封闭形态的弊端。对于前者前文已经重点讨论,兹不赘述。对于后者,莫莱蒂实际上涉及到了文本间性的问题。因为文体是由一系列文本所构成的符号集合。另一方面,文体也是向社会敞开的,所以没有文体常量即没有永久占据霸权地位的文体。小说文体在今天就进入了“问题化”时期。

另一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关系,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本尼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两部名著。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图谱之中,詹姆逊也突出文体(文类)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著名的文体(文类)批评。然而,无论从总论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从最终的答案来看,莫莱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是独具一格的。综上所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莫莱蒂整个思维的主要理论背景。虽然他直接接受了卢卡奇的命题“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但与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莫莱蒂对该命题的思考体现出三个特色:第一,形式不是概念性的、抽象的存在,或者是为了理论的需要性存在,他将其落实为文体理论和文体实践与样式;第二,对形式的认知不是采用形而上学的演绎方式和经验论的归纳模式,而是直面文体形式的数量态、时间态、历史态和地理空间态;第三,他对文体形态的剖析使用了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应该说,其马克思主义立场就体现在不断地使用和贴近文体的物态或者物质性。这就使他的“形式的唯物主义”突破了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两分而二元对立的思辨模式,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于形式研究的独特贡献。虽然有些学者将他视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笔者认为,莫莱蒂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没有显示它在拆解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结构。诚然,莫莱蒂的探索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本尼特就批评莫

莱蒂忽视了制度因素对某些形式的发展的影响(277-97)。莫莱蒂对形式的研究也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他对形式的计量研究在认识论前提上的论证还不够充分。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其结论未必都一定正确,但所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的方法值得深思。从这个角度看,莫莱蒂的多样化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或许可以说,莫莱蒂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这个范式正在不断扩张,也正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检验。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莫莱蒂都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注释[Notes]

① Genre 在近年中译文本中一般译为“文类”,本文依据中国文论传统译为“文体”。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路易斯·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Althusser, Louis.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n Althusser Reader*. Trans. Chen Yue.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Bennett, Tony. "Counting and Seeing the Social Action of

Literary Form: Franco Moretti and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Cultural Sociology* 3.2(2009): 277-97.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Wen B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Evenson, Brian. "A Fine Mess."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41.1(2007): 149-53.

Moretti, Franco. *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New York: Verso, 2005.

---. *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 Trans. Quintin Hoar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6.

---.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Forms*. London: Verso, 1988.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Mulhern, Francis, ed..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lliams, Raymond.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London: Verso, 1980.

(责任编辑:王嘉军)